

“新型记者”：重访群众路线的一段历史现场

李海波 虞鑫

摘要：“新型记者”是延安新闻传统的一个关键问题，亟待深入的学理化探究。尝试从内在于“延安”的视野，展示“新型记者”的复杂内涵。研究认为，整风改版树立了一种“新的新闻事业”，党报被定义为群众路线中政党与群众交往互动的桥梁纽带，新闻工作也溢出技术专业的界限，成为先锋队教育、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有效中介，从而与解放政治的历史进程深度关联起来。新的新闻范式要求相应的职业伦理与行为规范，呼唤一种与社会民众密切结合的“新型记者”的诞生，亦即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延安时期中共发明创造了一整套培育“新型记者”的体系模式，新闻工作者经历了从无冕之王到人民公仆的艰难转变。“新型记者”的理论与实践在群众路线的逻辑中展现了新闻业的丰富意涵，有助于当代新闻从业者打破市场化、专业化新闻业的刻板想象，在一种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格局中来重新理解新闻的社会角色以及新闻人的职业追求。

关键词：新型记者；群众路线；职业规范；新闻改革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9)01-0039-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新闻传播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日趋推进，新闻从业者群体也经历了深刻转型，一方面从改革前统一的宣教系统干部转变为多元分化但主要是“挣工分”^[1]的雇佣劳动力，^①另一方面这个群体的价值理念和实践范式也发生了复杂变化。关于后者，学界一般认为当代中国新闻界主要存在两种职业规范：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统，包括政治导向、党性原则、宣传喉舌等；二是西方舶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包括职业独立、客观性原则、公共服务等。^[2]在研究者通常采用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中，这两种职业规范构成对立冲突的紧张关系，“政党”“国家”被认为是限制专业自主性、与公众利益相对的压迫性结构或者说“威权力量”，而新闻专业主义的关键前提则是独立于政治控制，行使专业社区的自治权。^[3]

从近年来对于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观察访谈所获得的诸多经验材料来看，这个群体的价值规范普遍地倾向于新闻专业主义，例如将新闻工作的社会作用理解为传递信息、满足受众/消费者的需求，在操作准则上追求中立、客观和自治，服务公共利益的基本方式是监督政治权力。^②有研究者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新闻领域“文化领导权”的衰落，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新闻传播学与新闻观念风靡中国新闻学界业界，而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则遭到很大程度的消解。^[4]换句话说，当代的思想和知识状况决定了新闻从业者关于新闻工作和自身角色的理解，也限制了他们的想象空间——比如关于超越性的“新闻理想”，新闻从业者似乎很难超越“看门狗”(watchdog)、“扒粪者”(muckraker)等欧

^①关于新闻劳动的商品化，王维佳做过深入考察。王维佳. 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②较近的实证研究可参见：周睿明，徐煜，李先知. 液态的连接：理解职业共同体——对百余位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7；赵云泽，滕沐颖，杨启鹏等. 记者职业地位的陨落：“自我认同”的贬斥与“社会认同”的错位. 国际新闻界，2014，12；张志安，张京京，林功成. 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调查. 当代传播，2014，3；等等。

美新闻神话的天花板。

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闻知识的创新特别是对中共新闻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深入发掘,在当前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市场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并未摒弃一些重要政治底线或者说社会主义遗产。就新闻工作者而言,21世纪以来绵延不断的专项教育尤为引人瞩目,举其荦荦大者如“三贴近”“三项学习教育”“走转改”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更在全国新闻界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在这些专项教育中,对于中共新闻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强调可谓一以贯之,然而在实践中多少存在形式主义问题,在理念上也有僵化、教条化的弊端,例如片面凸显党性原则这一“物化的制度”,而对其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思想体系论述不足,尤其缺乏对群众路线这个更核心的新闻理念的系统阐发。^[5]新闻学界对于上述偏颇或许负有一定责任,因为这些本应是学科内部的重要议题,但目前学界显然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知识成果。相反,照章背书的教条主义学风以及充满政治套话的刻板文风,甚至造成了单一话语风格的闭路循环,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

笔者尝试回顾中共新闻传统中比较成熟完善的新闻工作者规范——延安时期“新型记者”的理念和实践,希望经由这段历史遗产的重新发掘,为新闻知识分子的职业想象打开新的可能空间。

关于“新型记者”的学术探究,截至目前寥寥可数。陈力丹、居然等研究者依据《解放日报》社论《政治与技术》,指出“新型记者……是区别于其他政党和个人新闻事业的党的新闻工作者”^[6],要点大致包括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结合、忠诚于人民解放事业、遵循“政治第一,技术第二”原则等^[7]。这样的概括基本沿用了党报社论的表述,对“新型记者”的内在理路与相关背景缺乏细致分析。黄旦和周叶飞则穿过政治话语的表层迷雾,从身份意识、业务操作和开门办报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新型记者”的本质是党的喉舌、眼睛、耳朵,延安时期批判“无冕之王”“技术至上”观念、树立全党办报模式,目的是取消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性、消解新闻专业的壁垒,“新型记者”的塑造实际上消弭了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体性。^[8]

从逻辑上说,党报改版确立了新的办报方针,这就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职业伦理与行为规范,呼唤一种“新型记者”的诞生。因此,研究者对于办报思路的理解,直接决定了“新型记者”的阐释。在此之前,黄旦对《解放日报》改版与政党政治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改版所创立的新闻范式是“以组织喉舌为性质,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为理论框架”。^[9]亦即是说,“党性”构成了改版后新办报方针的核心。“新型记者”的研究显然赅续了上述思路,关切点主要是新闻工作者与政党/政治权力的关系,并在这个视角上对“新型记者”做出了精深周密的探讨。

然而,将“新型记者”界定为党的喉舌、眼睛、耳朵,理解为附属于政党机器的被动的、丧失主体性的“齿轮和螺丝钉”,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不符合经验材料的情况。延安时期对于“新型记者”的定义,通常是“工农兵记者”“人民公仆”“群众勤务员”,也就是从新闻工作者与群众的关系角度进行界定。进而言之,延安时期新闻活动主要不在政党与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上展开,彼时的中共通过群众路线重建了与阶级基础的密切关系,达成对列宁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体制的突破创新,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军队致力于组织和动员民众参与抗战建国与边区全面建设。而作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现代化大众传播手段,报纸在党的组织和宣传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成为组织和动员民众的有力武器。换言之,延安时期新闻事业的主题是党报与民众的关系,群众路线构成了延安新闻范式的灵魂,党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毋宁是一种工具性的政治要求。^[10]

由是观之,究竟何为“新型记者”仍然有待探析。笔者将该问题置于中国革命及其新闻业的“内部视野”,^①综合利用中共文件、报刊资料、文集、回忆录、传记等材料,并借鉴其他学科延安研究的成果,首先考察延安时期中共办报思路的裂变及其对新闻工作者职业规范的新要求,继而在比较毛泽

^①汪晖认为,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不能全凭当代的理论范畴和知识框架,真正有益的分析应当进入历史肌理之中,以研究对象的知识与逻辑来分析理解。参见:汪晖. 十月的预言与危机——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8, 1.

东和葛兰西知识分子观点的基础上阐释“新型记者”的内涵,接着通过新闻界整风运动和“新型记者”培育过程进一步分析新的伦理规范的含义及其实施情况,最后讨论“新型记者”这段历史经验对于当代的启发意义。

二、“新的报纸”与“新的新闻工作者”

延安时期关于“新型记者”的论述,最早见于博古的讲话。1942年9月1日,党报改版后的第一个记者节,延安新闻界举行盛大纪念集会,杨尚昆、博古、凯丰等人先后讲演。其中,“博古同志的讲话中心为新的报纸党报及新的新闻工作者,应有的新意义及条件”,^[11]博古指出,“作一个新的新闻事业工作者,他将遇到从前旧的报纸从业员想象不到的困难。因此,新闻事业对他的要求更大,更高。首先,要求我们的记者有坚强的党性,要求他是好的党员,好的革命者,随时带着党的阶级的眼睛,要脱掉知识分子的高傲习气,恭敬勤劳地向群众学习,不要写那些政治的空谈!”^[12]

博古的这次发言,目前可见者仅有如上片段,出自《解放日报》记者黄钢发表于记者节次日的一篇通讯。这段话从内容上看,“新的新闻工作者”首先要具备党性,其次应当践行群众性——“脱掉知识分子的高傲习气,恭敬勤劳地向群众学习”。这个表述具有鲜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底色,也是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改造的经典术语,其核心在于转变启蒙主义立场中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的关系,树立一种新的群众观点。在引用完博古的这段话后,黄钢抒发感慨:“想想,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困难在于深入到群众里去。”接着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新闻记者走向田间地头、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呼声、发动通讯员写稿等方面的努力与不足。可以看出,对于博古“新的新闻工作者”的论述,黄钢主要是从群众性的面向去理解和阐发。

“新的新闻工作者”应具备党性原则和群众观点,这是由“新的新闻事业”“新的报纸”所决定的;不过究竟“新”在何处,亦即整风改版后确定的党报方针,博古在这里并未解释。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一点应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从1942年4月中宣部发出第一个“四三决定”开始,延安各界全面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包括集体研究“二十二个文件”,以“文件精神”即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检查工作等环节。^[13]在新闻领域,整风学习引发了新闻理论创新的热潮,此时关于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的讨论,充溢着理论自觉与自信的朝气,敢于冲决各类教条的束缚,想象一种不同于古今中外既有模式的新闻图景,文章往往以“我们的报纸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的报纸”作为开场白,然后铺展开去。^①也就是说,关于新闻事业性质的理论思考,是这次学习运动的首要内容之一。就在博古这次演说的前几天,1942年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重要社论《展开通讯员工作》,开篇对“我们的报纸”亦即博古口中的“新的新闻事业”作出如下界定:

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是党决定政策的依据;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行动,也是考验我们的政策与工作的标尺;党教育群众,不是高高在上地用空洞的原则、死板的教条去照本宣科的说教,而应该是站在群众之中,通过群众耳闻目见的活生生的事实之分析与理解,使群众逐渐提高他们的认识。我们的报纸正是要负起这样的任务,这也正是我们的报纸之所以异于一般资产阶级报纸的基本一点。^[14]

这里显然是从政党(先锋队)与群众的关系、在中共的群众路线的逻辑中,来定义“我们的报纸”的性质、角色和功能。相比毛泽东阐释群众路线的经典文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社论提前近一年,但已经颇得群众路线之神韵,即政党行为(制定决策、开展工作)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回应社会需求、解决群众问题,因而正确领导方法是“从群众中来”(集中群众意见,以此制定政策),“到群众中去”(宣传政策,贯彻落实并接受检验),如此无限循环。^[15]可见,作为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实际是政党和群众的持续互动过程,其中信息(意见、需求、政策)的通畅流动至为关键。这固然

^①《解放日报》1942年下半年刊发了大量相关文章,例如社论《展开通讯员工作》(1942年8月25日1版)和《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1942年11月17日1版),杨永直的文章《健全我们的通讯网》(1942年9月1日2版),等等。

需要整个政党组织有效运动起来,但专门从事信息采集和传播的新闻事业,无疑应当扮演重要角色。^①

在群众路线的理想实施状态中,政党与群众的目标和行动趋向一致,而作为两者之沟通媒介的党报,自然既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新闻事业的党性与群众性在群众路线的逻辑中融为一体。可见,“我们的报纸”的根本特点,或者说“新的新闻事业”的实质,正是群众路线中政党和群众交往互动的“桥梁”“纽带”。这是整风改版所形成的新闻学“常识”。当时的《解放日报》颇有阐述,例如记者杨永直就在一篇专论中写道:“我们的报纸,不能是迎合一般人脾味的‘消闲品’,也不能是营利的商品……它必须成为党和广大群众间的纽带。”^[16]

社论还谈及“党教育群众”的问题,认为“我们的报纸正是要负起这样的任务”,这实际上是党报中介作用的具体内容之一。在延安的语境中,党对群众的“教育”有着特定的含义,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知识传授和思想灌输,而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意识的启发,即作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通过细腻繁复的教育、动员和组织工作,将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出来,形成政治主体性。延安时期群众路线的独特之处,也是毛泽东思想对于列宁主义的重要超越,在于政党和群众之间并非单向度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师生关系。^②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17]在向群众学习、与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先锋队政党与群众紧密结合、相互塑造,在教育群众的同时也教育、改造政党本身。

延安时期党对新闻事业的规范性要求,应当置于上述政治视野中方能获得确切理解。毛泽东1948年对晋绥新闻工作者的谈话——这篇文献可以视为延安新闻经验的系统总结,就是在阶级政治的大框架下来论述新闻工作。毛泽东首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如果把这段通俗语言“翻译”成马克思的理论术语,那就是启发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引导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终极使命。从这个基点出发,毛泽东谈了他对新闻工作的期望和要求,“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18]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新闻工作从属于革命整体的政治逻辑,“新闻为政治服务”。然而这里的“政治”,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结构性的权力关系,不能窄化为权力操控或官僚科层体系,而是群众解放、人民当家做主的总体性政治。正如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说,“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19]在这样的视野下,新闻为政治服务,并不必然导致自主性的压制,反而敞开了广阔的空间,促使新闻工作者超越逼仄的个人天地和专业苑囿,去触摸更高远而复杂的政治命题,把个人命运、职业生涯与整体的历史进程关联起来。^③博古说的“新的新闻事业”对“新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大、更高的要求,背后的深意或许正在于此。

正是从这种政治观出发,《解放日报》1943年6月10日的社论《政治与技术》,先是全面批判了新闻领域“技术至上”的观点,反复申说“政治”对于新闻事业的统领地位。在这个论述中,“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置换为“整体与局部”“长远与眼前”“集体与个人”等范畴。社论继而在破与立的基础上,指明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方向——做“一个新型的记者”,亦即“一个工农兵的记者”。看起来颇为奇怪的是,社论通篇谈论“政治”,但并未交代“政治”的确切含义。这在当时的语境下似乎不难理解:1942年5月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赋予了“政治”特定的内涵,经过声势浩大的整风学习,在这篇社论发表之际,“政治”应当已是无人不晓的“习得”话语。由于“政治”是阶级政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宏伟愿景,因此对于遵循“政治第一,技术第二”原则的“新型记者”,社论并没有凸显其服从组织纪律的“党性”面向,而是主要从“群众的政治”角度加以规范:

^①关于党报在群众路线中的角色,解放日报社采访通讯部部长裴孟飞做过详细论述。参见:裴孟飞.贯彻全党办报与培养工农通讯员的方针.解放日报,1943-08-08(4).

^②白钢称之为“师生辩证法”。参见:鄢一龙等.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一章.

^③此处受到周展安的启发,参见周展安.重新认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普遍性和新颖性.文艺报,2018-05-23(3).

我们的新型记者,对于工农兵应有热爱,要有当他们的小学生的态度,要有当他们“理发员”的志愿。我们相信真理,这个真理即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让我们更密切的与工农兵结合,更诚恳地倾听他们的意见,更真切地表达他们的意见,更耐心更友好地帮助他们掌握新闻事业,掌握这一战斗的武器。新型的新闻记者,他们的技术修养是和政治修养分离不开的,是和为群众服务,和群众结合的精神分离不开的。^[20]

三、“新型记者”与“有机知识分子”

《政治与技术》一文在定义“新型记者”时所采用的方法和路径,尤为值得注意。社论写道:“我国社会上有些名记者,他们的名字在某些阶层中很响亮;但是直到现在,在工农兵中名字很响亮的名记者还待努力。这种新型的记者,比之以前任何的名记者更伟大得多,因为他们的名字是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型记者”的确切含义,就是“工农兵的记者”。^[20]这个界定方式,一方面让人联想起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讲的“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我们的报纸”同样如此;另一方面,这个定义没有对记者群体及其活动展开本质主义的分析,而是从整体的社会关系的角度,从记者与特定阶层/阶级的实际关联中进行界说。这样的方法论视角,让人联想到葛兰西对于知识分子的经典论述。李洁非和杨劼在延安文学的研究中,指出毛泽东和葛兰西的知识分子观点存在相似性,^[21]这个洞见启发我们对“新型记者”作更深层的思考。

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者,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出版单位的驻地清凉山被时人公认为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①这一时期并没有单独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政策文件,而是纳入知识分子的范畴,一起作为“问题”接受学习和改造。毛泽东对晋绥新闻工作者说:“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18]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即对于延安新闻工作者的理解,必须置于知识分子的总体问题之中。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1939年,他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件,标志着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调整,从之前的猜忌、疏远转变为重视、利用。^②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形成了知识分子潮水般涌向延安的壮观图景,许多新闻工作者如胡绩伟、穆青等人,就在此时从国统区奔赴延安。这份文件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能力和理论思考深度。他首先指出革命事业离不开知识分子群体,批评过去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心理,“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号召今后应该“放手地大量地招收”,但要注意“好好地教育他们”,使知识分子“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同时还应“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并强调“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22]

毛泽东的上述知识分子观点,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庶几相近,表明两位共产党领袖在同一问题的探索上达到惊人的殊途同归。如果用葛兰西的理论语言来注解毛泽东的思想,那么“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与“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意味着知识分子与特定阶级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即葛兰西所说“同质性”。^[23]这是“有机”(organic)概念最基本的含义,既有隶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管家”“代理人”执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有机知识分子,又有紧密联系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24]在葛兰西的论述中,有机知识分子有时专指后一种,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才能达到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的统一,这是普遍的、彻底的“有机性”。^[25]葛兰西指出,以往的唯心哲学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则发现

^①这一点得到诸多回忆性文章的验证,可参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1977年)//何其芳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62;黎辛.亲历延安岁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59;蔡若虹.赤脚天堂——延安回忆录.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74.

^②关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流变,可参见:翟志成.中共与党内知识分子关系之四变(1921—1949).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1994:23.

了历史主体,即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工作、认知活动根基于无产阶级的实践,是他们认识世界、形成阶级意识的过程,这样的认知活动最终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围绕历史主体而实现统一。^①

葛兰西通过“实践哲学”的阐释,发现了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重要性,在他看来政党的政治使命正在于此,“某些社会集团的政党不过是它们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培养自己有机知识分子范畴的特定方式”,^[23]“政党是新的完整的和全面的知识分子的培养者,以及被理解为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其中发生的坩埚”。^[26]无独有偶,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也通过《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演,重新解说了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的关系,并以全党之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文化运动,推动知识分子与群众的结合(有机联系),培育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向党内高层解释了文化政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目的是解决结合问题,而整风则是破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27]借助葛兰西的理论术语,延安整风或许可以视为革命政党培育有机知识分子的过程,即将传统知识分子“化”为工农群众的“有机”代表,“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28]

毛泽东和葛兰西知识分子观点的对比分析,为理解“新型记者”的复杂内涵提供了重要视角。这是在党报改版和整风运动的大背景之下,中共对新闻知识分子提出的全新职业规范。“新型记者”首先应当树立新型世界观,如社论《政治与技术》提出的,“我们相信真理,这个真理即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坚信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唯其如此方能自觉地将自身工作融入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进程之中。“新型记者”的工作原则是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与他们密切结合,倾听和表达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掌握文化和新闻事业。这也决定了“新型记者”在专业操作上不可能是“中立”“客观”的观察者、记录者,而是社会生活的深度参与者,“既当记者,又做工作”,“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延安记者的采访准则。^[29]同样不可忽略的是“新型记者”与政党的关系,延安时期中共主导了文化上的革命,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改造,“新型记者”放弃了基于启蒙立场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无冕之王”“为民请命”等专业期许,在党的组织向导下、以政党政治的途径与群众建立密切关联,因此“党性”原则也是“新型记者”必得遵循的基本规范。概而言之,所谓“新型记者”实际上是一种围绕阶级先锋队、通过政党政治而与人民群众深度结合的新闻领域的有机知识分子。

四、身心历险:新闻界的整风运动

如果说葛兰西的理论还停留在纸面,属于“失败的革命者或书斋里的革命者……在狱中深刻地思想着革命或在书斋里诗意地想象着革命”^[30],那么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则发明并实施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技术和手段,完成了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改造,为中共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及革命建国奠定了文化基础。李洁非和杨劭通过对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过程分析,提炼了“有机知识分子”培育模式的诸般要点:

(一)集中和强化的政治学习;(二)在集体环境下诉诸思想斗争和个体灵魂剖白,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三)政治身份的组织化甄别与确认;(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程序;(五)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民本主义”伦理,移情并过渡到“工农兵崇拜”,否定和放弃知识分子价值观当中其他与无产阶级世界观不一致的部分;(六)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相结合,使知识分子改变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他们对自己“身体属性”的观念和理解,从内到外真正失去旧知识分子历来所有的那种角色体验……这是一种从内到外,从精神到行为,从思想到政治,从个体催化到组织威服,全方位的知识分子改造体系。^[21]

新闻事业在中共的组织体系中居有特殊地位,在1942年4月全党普遍整风开始之前的2、3月,

^①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逻辑,可参见:汪晖. 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7-43.

党报率先经历了深刻改造(即“改版”),以达到毛泽东所说“经过党报来改造党”之目的。^[31]这一阶段的整风主要是回应党中央、毛泽东以及社会各界对办报方针的批评,是外部压力引起的变革,可称为“外向整风”。在此后的普遍整风中,新闻界与整体步调较为一致,重点是“党报工作人员本身的思想改造”,被称为“内部整风”。^[32]这是在新的办报思路下构建相应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并使之成为新闻工作者所自觉接受的过程,可以视为“新型记者”的培育过程。从目前可见的材料来看,新闻界的“内部整风”大体包含李洁非和杨劫归纳的上述要点,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体现了新闻事业本身的特性,但另一方面更主要地服从于总体的文化与政治逻辑。

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在清凉山合署办公,属于一个伙食单位,由同一个编委会领导。两社开始内部整风的最早记录,是在1942年4月10日。^[33]这个时间点与整体行动十分合拍——在一周前发布的“四三决定”中,中宣部要求延安各单位“有准备的有计划的”组织学习、讨论整风文件,并以文件精神检查部门工作。^[34]清凉山的新闻单位谨遵中央部署开始学习,编辑部每天上午完成工作后,下午和晚上都用来学习文件,外勤记者则随身携带文件,随时阅读。^[35]同时按照业务部门分成若干小组,由组长带领讨论文件、写作笔记、反省检讨,“每个人在发言时联系自己思想,大家敞开思想,心情愉快”。^[36]开始阶段的学习讨论是热烈踊跃的,主题也并不明晰,清凉山的墙报《春风》创办之初贴满了批评官僚主义的文章,颇合当时延安城喧闹的“自由主义”氛围。^①经过5月的文艺座谈会和6、7月间的王实味大批判之后,新闻单位的整风学习由初期无主题的畅所欲言,转变为集中地反省自身的“非无产阶级错误观念”,系统地讨论党报性质、党性原则、办报方针等问题。

《解放日报》国际部编辑吴冷西的经历,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转变。整风初期,吴冷西在《春风》上贴出文章批评报社的制度不够民主,重大事情由编委会关门决定,记者编辑们不知情,要求今后旁听编委会和党委会会议,呼吁报社大事应由编辑大会讨论通过。^[37]吴冷西的文章引起纷纷议论,他所批评的情况确实存在,副总编辑余光生在编委会上承认改版时“发动群众讨论不够,致使有些同志认为改版仅是缩小国际扩大国内。我们没有及时、具体地向群众解释、教育”,以后工作中“要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33]但这样的民主诉求显然并不符合整风运动的预期轨道,吴冷西因此受到批评,被要求认真学习文件并检讨反省。经过反复学习和讨论,吴冷西对党性原则有了深刻体悟,认识到党报是党的喉舌,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都是从党性延伸出来的品质,而且党性原则的合理性建立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能把人民群众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与长远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解放日报》在整顿和改造的过程中,明确解决了党报的根本原则问题,使当时像我这样的许多年轻的记者、编辑受到很大的教育,澄清了当时许多同志头脑中存在的什么‘无冕之王’‘办同仁报’‘为民请命’‘为民立言’等等违背党性原则的糊涂思想”。^[38]

整风学习的另一项内容是检查工作。在1942年8月陆定一担任总编辑之前,两社的“检查”侧重采编业务问题,例如选题不均、文风枯燥、发稿混乱等。博古后来曾经做出检讨,说即便在4月改版之后,他对报纸的领导依然存在“强调技术,忽视政治”等错误。^[39]陆定一履新之后更突出“政治性”,要求以无产阶级的立场、方法和观点检查新闻工作,在此之后形成了一个新闻理论创新的蓬勃期,以阶级话语为核心的新闻理论渐趋成型。这种理论创新的自觉和自信,在陆定一自己笔下得到充分表达:“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和理论不适于根据地实情和革命战争的需要,必须与之展开理论斗争,丰富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关于新闻学的实践和理论”,做到“使任何资产阶级的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之新纪元”。^[40]“新型记者”的概念正是在这种创新氛围中提出的,如前文所述,这个概念从群众解放的阶级政治视野来规范新闻工作者,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堪称这一时期新闻学创新的典范成果。

^①延安时期的“自由主义”话语,不同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英美式自由民主思想及其制度安排,而是一种政党意识形态的界定,主要指违反党性和集体主义原则的行为,如生活散漫、个人意气、自由放任、无组织无纪律等。毛泽东曾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并严厉批判。参见: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59-361.

参加生产劳动是新闻界整风改造的重要一环。当时的清凉山呈现一种奇特的景象:记者编辑们投身体力劳动,开荒、纺织、种菜、养殖、运输、烧炭、卷烟、磨豆腐、加工文具……报社俨然成了一个种类繁多的生产基地,各部门、各人之间展开火热的劳动竞赛。^[41]这在过去通常被归入大生产运动的范畴,与整风运动并列,但在当时的语境中,个人生产实是新闻知识分子改造、形塑“新型记者”的关键步骤,艾思奇曾撰文论述“劳动就是整风”^[42]。穆青的长篇通讯《本报编辑部的个人生产》记载,解放日报社编辑部40多人,按照各人特长和工作时间组织起了农业、纺织、文化供应等生产种类,其中农业和纺织是中心。男劳力以开荒种地为主,三五人一组设定开荒面积,进行劳动竞赛,国内部编辑苏远创造了一亩七分的开荒纪录。穆青在介绍完劳动情形后写道:“劳动改变了知识分子的面貌”,这种改变不仅是“我们的手满是水泡,脚底刺满了荆棘”这些外部表现,更关键的是观念转变——刚开始劳动时,很多人反感挑粪,担心弄脏衣服、染了疾病,碰到熟人总要低头躲避;经过一段时间的大生产之后,大家的劳动观发生变化,积极性也提高了,“由骡马粪的拾运到跳进人家的茅坑”,无不干劲冲天。对比编辑部同事前后的表现,穆青认为“农业劳动……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最好的方法”。^[43]

报社女同志则以纺织为主。在延安时期,纺车不光是一件生产工具,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还有另一种神秘力量。在介绍报社的纺织小组时,穆青以“在纺车声中改造”作为小标题,可谓一语中的。对此,副刊部编辑陈学昭在自传体小说中提供了细腻的描写:

当她第一次坐在纺车的面前,她不知道怎样去下手:一会儿锭子跳了,一会儿棉条断了,急得她一身大汗;这里拉一把,那里敲一下,两只手弄的满是污脏的油和灰土。她看着自己这一双手,心里不禁感叹着:“这本是一双弹钢琴的手呵!”还没有抽成三、四尺长的线,已经累得好像做了一天苦工,精疲力竭了。

但是一天一天地,她坐在纺车边的日子愈多,时间愈久,她的思想跟着那一根一根的线抽出来,愈抽愈长,愈抽愈多。

她开始想到:自己活了几十年,没有织过一寸布,没有种过一粒米,但却已穿过不知多少丈布,吃过数不清的米了!她为自己这一新的思想觉得惊奇,由惊奇而感到羞愧,由羞愧而感到负疚,感到有罪,感到对不起劳动人民!但是,她却还不能不带着忧郁地想:“从前做牛做马学得来的一点法文,一天一天地荒弃,要是从前就是一个劳动的妇女,哪怕是一个文盲,总比现在这样不三不四的好……”^[44]

这段心路历程颇堪玩味。陈学昭是留法归来的文学博士,即使在群星璀璨的“延河边的文人”中,陈学昭的“小资气息”也是异常突出的,这一点给访问延安的赵超构留下深刻印象:“陈学昭女士脸容丰腴,鬓发修整,很别致的装束(白羊毛背心外加‘夹克’、西装裤、青布鞋),态度娴雅”“她还保留住一点爱美的习气,就是在谈吐上,也含有法国风的娴雅与含蓄”,赵超构称她为“巴黎回来的女绅士”。^[45]就是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在最简单、最原始的纺车面前彻底败下阵来,在操作娴熟的农妇面前自惭形秽,这种挫败感引起她对高等教育的怀疑,“哪怕是一个文盲,也比现在这样不三不四的好”,而这样的怀疑意味着身份认同的动摇,即以往自诩为“先进”“优越”“启蒙教师”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百无一用,甚至是劳动人民的寄生虫,这让她感到羞愧歉疚,因此“感到有罪,感到对不起劳动人民”。

推动知识分子转变对工农兵的态度和情感,在伦理道德层面颠覆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关系,可以说是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改造的核心命题,也是大生产运动的深层诉求。倘若说毛泽东的理论阐释稍显缥缈,不容易刻入脑际,那么亲身参与劳动则能立竿见影。以陈学昭为例,一架中世纪的纺车竟将一个拥有最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乡间男女老幼皆能操作自如的工具,知识分子却玩不转,“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学生”这种反复言说的大道理,顿时有了现实的依托——正如副刊部另一位编辑方纪所写的那样,“我一坐到纺车前,就感到知识分子的渺小,和劳动人民的伟大!”^[46]由此看来,体力劳动不仅在精神上击溃了“启蒙者”“无冕之王”的优越感,使他们从天上落入凡间,而且在伦理上调整了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儒家传统的民本意识在

劳动中被召唤出来。^①在如此巨大的心理震荡下，“做一个工农兵的记者”“为群众服务，和群众结合”等规范准则，从政党的指令“内化”为知识分子的自觉实践。“新型记者”的锻造，至此完成最关键的一步。

五、结语

笔者尝试以一种内在于中国革命与延安新闻传统的视野，从多重面向揭示“新型记者”复杂而深刻的内涵。研究认为，整风改版将新闻事业纳入革命整体，成为群众路线中政党与群众交往互动的桥梁纽带，成为先锋队教育、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有效中介。“新的新闻事业”要求相配套的职业规范和操作准则，要求新闻工作者在政党的领导下与群众打成一片，使这个无根漂浮的知识分子群体，转变成一种与底层民众建立历史性联系的“有机知识分子”，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实现新闻工作及个体生命的价值。可以说，“新型记者”的主体性，无法以独立、自治等当代新闻框架来衡量，相反，延安传统的独特之处在于新闻工作者与政党、群众投身于同一场运动之中，相互结合与塑造，在动态的政治进程中融合生成一种新的主体性。

这段历史经验的启发意义，或许在于突破合理分化、专业分工等所谓现代性规律带来的视野促狭，超越新闻专业主义的有限想象，在一种更宏阔的历史与政治格局中来重新理解新闻的社会角色以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追求。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来说，重建这样的想象力显得尤为迫切。随着中国社会与新闻领域的激进市场化、新闻内容与新闻劳动的商品化，新闻从业者逐渐变为出售劳动力的雇佣工，“挣工分”式的新闻生产关系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劳动异化，亦即繁巨的生存竞争迫使新闻人疏离专业目标，新闻劳动日渐窄化为纯粹的谋生活动。^[1]上述进程内在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与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市场理性和资本逻辑在中国新闻业不断深化的产物。在当前的数字媒体时代，商品化新闻模式面临全球性危机，广告、投资、人才纷纷涌向更迎合市场逻辑的新闻聚合应用、社交媒体平台等互联网巨头，出于成本效益的考量，传统的专业化新闻操作及新闻专业人员遭到减削，甚至可能被抛出新闻生产流程之外。^[47]这一点在近年来中外新闻从业者大量的危机言说中体现得非常明显。^[48]颇为吊诡的是，在新闻从业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加速下滑、不断趋近物化的生产要素的同时，这个群体却表现出对商品化、市场化新闻模式的“认可或至少是别无他选”，^[49]由此更加凸显了重构新闻知识、打开新的想象空间的重要性。

关于新闻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效果，有研究者认为市场效益和政治控制实现了同步增长，^[50]但更应警惕的是市场化路径带来的基层组织力消解、传播民主化程度降低等政治影响。^[51]这实际是当前新闻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在一本讨论西方新闻业危机的新近文集中，学者们分析了商品化新闻模式遭遇的严峻挑战，在价值理念上重申新闻业的“神圣性”（sacred profession），即维系社会沟通交往、凝聚道德情感的重要建制意义。^[52]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记者”这段历史经验具有一定现实参照作用，启发我们对新闻与政治、市场的关系这样的基本问题展开新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夏倩芳.“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产品、劳动与新闻人. 现代传播, 2013, 9: 28-36.
- [2] 白红义. 以新闻为业：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研究.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14-21.
- [3] Jonathan Hassid. Four Models of the Fourth Estate: A Typ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Journalists. The China Quarterly, 2011, 208: 813-822.
- [4] 李彬. 中国道路新闻学(四)——挨打、挨饿、挨骂. 当代传播, 2018, 4: 4-6.
- [5] 王维佳.“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 经济导刊, 2016, 4: 28-31.
- [6] 陈力丹.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 83-84.

^①已有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存在共通性，中共的群众路线与儒家的民本主义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可参见：陈先达.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严晓岭. 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启示//李国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5: 67-79.

- [7] 居然. 中国共产党的“新型记者”. 新闻界, 2015, 17: 69-70.
- [8] 黄旦, 周叶飞. “新型记者”: 主体的改造与重塑——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之再考察//李金铨. 报人报国: 中国新闻史的另一读法.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3: 325-354.
- [9] 黄旦. 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李金铨. 文人论政: 知识分子与报刊.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50-280.
- [10] 李海波. 党报、列宁主义政党与群众政治参与——延安新闻业群众路线的运作机理分析. 国际新闻界, 2018, 3: 19-39.
- [11] 延安新闻界热烈纪念九届记者节 并追悼何云等同志 会后举行各种晚会. 解放日报, 1942-09-02(2).
- [12] 黄钢. 记者们的节日——延安纪念九届记者节追悼何云同志. 解放日报, 1942-09-02(2).
- [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1921—1949)·下册(第2版).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613-624.
- [14] 社论: 展开通讯员工作. 解放日报, 1942-08-25(1).
- [15] 毛泽东.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99-900.
- [16] 杨永直. 健全我们的通讯网. 解放日报, 1942-09-01(2).
- [17] 毛泽东. 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11月23日)//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第二册·内部资料, 1967: 238.
- [18] 毛泽东.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中央文献研究室, 新华通讯社.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 188-192.
- [19]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66.
- [20] 社论: 政治与技术——党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解放日报, 1943-06-10(1).
- [21] 李洁非, 杨劼. 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与文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 81-112; 108.
- [22] 毛泽东.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18-620.
- [23] 葛兰西. 狱中札记. 曹雷雨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 10.
- [24] 葛兰西. 葛兰西文选. 李鹏程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357.
- [25] 余一凡, 赵冶. 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概念新探. 理论月刊, 2016, 2: 25-29.
- [26] 葛兰西. 实践哲学. 徐崇温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17.
- [27] 毛泽东.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5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424-433.
- [28] 总政治部. 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194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9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56.
- [29] 田方. 延安的记者生涯//丁济沧, 苏若望. 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9: 150-154.
- [30] 解志熙. 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悖论//李向东, 王增如. 丁玲传(上).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5: 18.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修订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367.
- [32] 编写组. 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232.
- [33] 王凤超, 岳颂东. 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 新闻研究资料, 1984, 26: 147; 149.
- [34]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 第13册.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363-367.
- [35] 本报工作人员进行文件研究. 解放日报, 1942-04-30(2).
- [36] 陈学昭. 在解放日报社参加整风审干运动//任文. 我所亲历的延安整风: 下册(红色延安口述·历史丛书).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94.
- [37] 吴冷西. 回忆领袖与战友.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6: 239.
- [38] 吴冷西. 增强党报的党性——清凉山整风运动回忆//丁济沧, 苏若望. 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9: 22.
- [39] 博古. 我的初步反省(1944年1月)//朱鸿召. 延安缔造.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531.
- [40] 陆定一. 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解放日报, 1943-09-01(4).

- [41] 温济泽. 忆清凉山的战斗岁月//任文. 窑洞轶事(红色延安口述·历史丛书).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89.
- [42] 艾思奇. 劳动就是整风. 解放日报,1944-02-19(4).
- [43] 穆青. 本报编辑部的个人生产. 解放日报,1944-04-07(4).
- [44] 陈学昭. 工作着是美丽的.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268.
- [45] 赵超构. 延安一月.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95,137.
- [46] 方纪. 纺车的力量. 解放日报,1945-05-20(4).
- [47] Anthony Nadler. Making the News Popular; Mobilizing U. S. News Audience.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6.
- [48] J. C. Alexander, E. B. Breese, M. Luengo.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 Professional Codes, Digital Futur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49] 王维佳. 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291.
- [50] 周翼虎. 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 新闻学研究,2009,100:101-136.
- [51] 王维佳. 传播治理的市场化困境——从媒体融合政策谈起. 新闻记者,2015,1:15-20.
- [52] 黄顺星. 从何所来,去何所至:《新闻业危机的再思考》. 新闻学研究,2017,131:173-179.

"The New Journalist": Revisiting a Historical Scene of the Mass Line

Li Haibo(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Yu Xin(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new journalist", which needs more academic inquiries, is a key issue of the Yan'an journalistic tradition. From an interior angle of view,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rticulate the complex connotation of "the new journalis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ectification and relaunch of the party newspaper established "a new journalism career", in which the party newspaper was defined as the bridge and link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mass line. In this way, the journalism overflowed the boundary of a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became an effective mediator for the vanguard party to educate, mobilize, and organize the mas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emancipatory politics. The new paradigm of journalism required concordant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behavioral norms, calling for a kind of "new journalist"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grass-roo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vented and implemented a full set of remolding procedure, and successfully achieved the objective of raising the "organic intellectuals" in the sense of Antonio Gramsci. As the result of that, the journalistic intellectuals of the party newspaper went through the tough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uncrowned king to the public servant. The notion of "the new journalist" represented a complicated connotation of the journalism in the logic of mass line, which is beneficial to break through the visional limitation shaped by the stereotyped imagination of the market-oriented and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bringing about a re-understanding of journalism within a wider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Key Words: the new journalist; mass line; professional norm; journalistic reform

■ 收稿日期:2018-11-30

■ 作者单位:李海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上海 200241
虞 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 责任编辑:汪晓清